

兩岸文物保護的歷史、影響及心態（下）

韓秀

【內容提要】本文是一篇為慶祝故宮建院七十週年的演講稿，全文分三項子題進行討論：

（一）由於意識形態和歷史條件的巨大差異，兩岸在文物保護方面呈現完全不同的人文景觀。

（二）目前海峽兩岸對文物保護的態度，文物市場的各種現象也有涇渭分明的差異。文中就盜掘、走私、拍賣、建設性的破壞、古蹟存廢及博物館的營運作分析與比較。

（三）在價值與價錢的戰爭中，台海兩岸對文物保護勝負各異。

由於講稿頗長，擬依據上列三項子題分上中下三期刊載。本期以第（三）子題為討論主題。

價值與價錢的爭戰

由此，我們回到了人類數千年來不斷存在的一個爭戰，那就是價值和價錢的爭戰。自八十年代始，中國大陸迎來了所謂「改革與開放」的大潮，但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僵化，使得改革與開放在我第二次離開的一九八六年，並未顯示出真正的進步。自一九八六——一九九五這九年間，「改革」似乎已經在經濟上表現得比較突出了，我很想對這一改變在文物維護方面的影響有一點直接的感受，所以我在今年（一九九五）四月中旬避開了「四、五」和「五、一」這樣的敏感時刻，而在四月十五日下午到達北京。

從機場到北京飯店一路上看過來，覺得北京離文化已經越來越遠了，廣告林立當中看不到格調和品味，但是我仍然在想這是由近郊走向市區，不能說那就是北京。但是從北京飯店到王府井，那只有一箭之隔的距離，使我真正明白，那個本來充滿了「京味兒」文化傳承極其悠遠的老北京已經蕩然無存了。林海音大姐筆下的老北平自然是連我小時候花了十四年功夫也

沒有找見。老舍先生筆下的北京我見過，也在東安市場吃過糖葫蘆，在琉璃廠看過字畫，更在四合院裏住過十多年，但是，今天東安市場和老琉璃廠已經踪影不見。那怕是「新華書店」呢，最少，可以聞到墨香。但是「新華書店」得搬出寸土寸金的王府井，因為它不賺錢。空空蕩蕩，即將拆毀的「新華書店」窗玻璃上貼著一些大大小小的紙張，寫著愛書人的心情，是北京人的心聲之一。其中有這樣一句話「讓我們永存一個聯想，北京——王府井——東方文化——世界精華」。北京人心底的呼喊躍然「字」上。但是，今後的王府井剩下的只是「價錢」而已，那將是一條為賺錢而設立的街，不再和北京的文化傳統發生關連。



待拆遷的新華書店 筆者攝



故宮博物院

北京大柵欄 筆者攝



東琉璃廠「海王邨」 筆者攝

掉頭南去，我在前門樓子上也看到了巨大的市招，是一家公司的大廣告，廣告真正到了鋪天蓋地的程度。人們不認識路了，因為路的面目已經改變，而且掛廣告的辦法也千變萬化，橫的、豎的，自然是越搶眼越好，搶眼到那市招後面的店家反而看不到了，只有少數的店因為其高，其特色仍可以在混亂中發現到。位於前門外大柵欄的內聯陞鞋店，畢竟是將近一五〇年的老店，四層樓高，雕梁畫棟。什麼「皮茄克優惠」的減價廣告雖然一直拉到內聯陞二樓窗口，但是仍然擋不住內聯陞自己的氣勢。

琉璃廠的情形沒有那麼好了，琉璃廠老街已然不在了，即使是新街也已經模糊難辨，東琉璃廠把角，原來是一座滿規整的四合院，是中國書店，銷售善本書的所在。從前的天井裏，更是書店工作人員晒書的場地。現在是個古董商場，叫作「海王邨」。今年四月，我在那裏的時候正舉辦第三屆明清傢俱展銷，原來的天井裏已經架起塑料棚架，更分了樓上樓下，更像一個舊貨市場。在「海王邨」服務人員胸前別著證章，表明他們所出售的是文物商店所經營的古董。一九八三—八六年間，我在北京，那時候大陸當局在外交官離境時，都會派文物局的工作人員來外交公寓，再三強調，百年以前的文物不可以出境。我們在北京買些小東西，文物商店也會加火漆印，附上個小條，寫上「一〇〇年代」之類的。現在，最少我在琉璃廠看到的情形已大不相同。服務員向我介紹一隻「明代」小水盂，我問他：「明瓷能出口嗎？」他回說：「文物商店經營的，都能出口。」不過，爲了保險起見，我沒買那「明瓷」，只選了幾枚袁大頭而已。

一出「海王邨」，我就被一位年青人跟上了。他叫我：「阿姨，我有好瓷器，跟我去看一看好不好？」一看，就知道是農村來的，很誠懇的樣子，我問他：「到哪裏去看？」他手一指：「不遠」。順著西琉璃廠走了一段，拐進小胡同，三彎兩繞到了一家旅舍門口。走進去，櫃檯人員視而不見，想必是早已心領神會。走道裏撲面而來的味道真正是似曾相識，汗酸、尿騷、鞋臭，各種氣味中再加上煙和酒。門上只有小布簾，簾兒一掀，裏面還有三位，正在端著飯盒兒吃中飯，飯菜和火車上的伙食差不多。一見有人來，大家忙著張羅，也忙著掀床單，把床下的東西拉出來給我看。稻草、草紙層層包裹之中露出來的瓷器，當然不是新產品，但就我自己那點常識來看，估計也是民國初年的東西，多是日常用品，看我不甚中意，他們說：「還有好的」，於是有些青花和門彩出現，小小的器皿，倒還精緻。據說：「是從人家裏收來的」。我想，那還好，不是

陪葬品。正想着，赫然從紙包中，露出一個陶俑的頭。那青年來自陝西。「瓦人太大，不好帶，就帶個頭。」他靦腆着。另一青年給我看小一點的一包，那是一隻手，五指尖尖，斷臂處痕跡新鮮。「那一個瓦人已經殘了，我看這手還行，就帶了來。阿姨，不貴，您給一千就成。」

我在他們那又髒又亂的床上坐下來，問他們是哪裏人，爲什麼要作這長途販運的買賣。回答是他們來自陝西、四川和湖南，那陝西青年說：「黃土地上，不弄這個不富。」那四川青年更簡短：「種地，活不了。」所以，那四人以及住在同一旅舍，經營同一號生意的十多位青年都是農民。我明白告訴他們，東西我不要買。他們馬上問說：「您住哪裏？我們再帶點好的去給您看。」我想北京飯店是有名的管理甚嚴的一家賓館，我告訴他們也無妨。誰知，他們非常坦然：「北京飯店？沒問題，我們先打電話。」他們還挺有禮貌的。其中一位怕我迷路，把我送回東琉璃廠。路上，我問他：「被抓了怎麼辦？」他頭也不回：「罰兩千，東西沒收。」「那東西怎麼個結局呢？」他老老實實回答：「不知道，沒想過。」過了一會兒，他瞧瞧我：「真上繳國家的，怕是少數吧？」一臉的茫然，不太懂我爲什麼耽心文物的結局與流向。

茫然，是最普通、最平常的這類所謂「文物販子」的心態。人家富起來了，自己也得想法子，倒騰文物，錢來得快。至於文物是什麼。文物與文化歷史、民族之間的關連，就不是他的事了。

我的心情可想而知。往榮寶齋哪邊走一走，想去看看文房四寶，給愛字的台北朋友尋兩件小禮物。一得閣已經不再是文房用具專賣店，成了「集雅文化城」。榮寶齋還好，但是那年青服務員的態度與琉璃廠極不協調，匆匆買了點東西，叫上一輛計程車，請司機先生在西城稍稍轉一轉，再回北京飯店。那青年司機極爲善解人意，從後視鏡裏瞧著我，說：「阿姨，您是不是瞧著琉璃廠傷心了。我帶您瞧瞧兒別的吧。」順著牛街轉到右安門、廣安門一帶，地名上仍有「門」，真正的城與門多半已踪影不見。「瞧見沒有，那是座木建築，旁邊兒那個大煙筒成日的黑煙滾滾，下回您再來北京，就瞧不見了。」司機先生閒閒一句，我按動了快門兒，留下那座木建築（一座十多層的塔），和那個雄糾糾的煙筒。我問那司機先生：「北京又拆又建的，京味兒越來越少，你覺得怎樣？」「當官兒的不心疼，我們能怎麼樣？外國人來北京，瞧什麼都好，都新鮮，都是寶，咱們自己人倒不那麼覺著，要是破銅爛鐵、碎瓦片子都能換外匯，那就換吧。完了完！」

「完了完！」一句話，全拆完了，賣完了，也就沒有了，文物不能復生，這個意識他是有的，這位文革時期出生的年青人真是很可愛。然後他帶我去看六年前，坦克留下來的履帶痕跡和彈痕累累的廣場四周的建築物。「文化人才真懂得珍惜文化，六年前倒下去的那批人和您大概有共同語言。」他笑笑地說：「可是當官兒的，見不得文化人，非趕盡殺絕不成，這就用著了一句北京話叫作『沒法兒辦！』」他很有些忿忿然了。

第二天，我帶著許多的疑問去了北京故宮、紫禁城和九年前一樣破舊，真正好看的地方還是御花園，有樹、有花、有些生機。因為喜歡看清盛世的瓷器，所以特別去了陶瓷館。展廳和過去一樣昏暗，光線不足，服務人員也和過去一樣坐在折疊椅上吃中飯，地仍是高低不平，破損的磚地、牆頭上，斑駁的琉璃瓦上也仍有蓬蓬的狗尾巴草，斑駁的紅牆也依然記錄著歲月的滄桑，只是展品似乎是更少了，清盛世的瓷器一共沒有幾件，圖錄是早就看過的，實物只看到一件雍正年間的鬥彩花卉紋花瓣尊，其他都未見實物。很想在故宮買一本圖錄，也沒有買到，我是回到台北之後，在延吉街的義之堂買到的。

故宮真是空空蕩蕩的，但是，那是一個號稱有上百萬藏品的博物館，怎麼會這麼空呢？故宮工作人員告訴我：「都裝箱了。」為什麼裝箱呢？回答是，「同類的文物有一件給大家看就行了，東西太多了，裝起來比較好。」那麼圖錄上的文物並不



北京廣安門南一景 筆者攝



西琉璃廠一景 筆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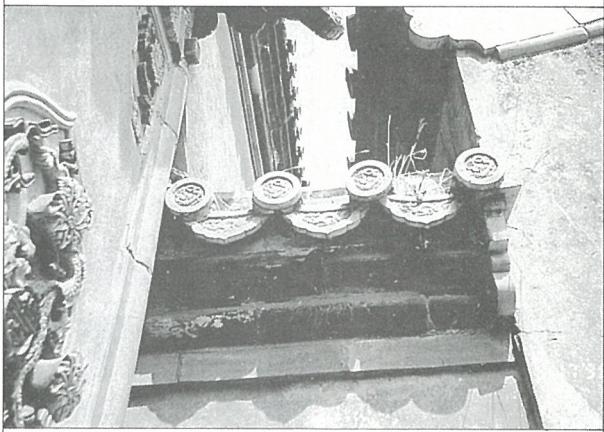
重複，爲什麼都看不到呢？沒有回答。



一九九五年四月作者攝於北京故宮御花園



北京故宮陶瓷館大門 筆者攝



北京故宮一角 筆者攝

「東西太多了」，是故宮工作人員反復向我說的「一句話，他甚至說「建國初期，周恩來出國去蘇聯訪問，帶給斯大林和蘇共領導人的禮物不少都來自故宮。」看我驚訝的樣子，他反復解釋給我聽，清宮的瓷器，屬於日用的，通常不論件，都是論桌，以桌爲單位來計算的，「一桌上百件，太多了，太多了，送出去幾套，也不礙事，實在是太多了，沒有地方擱，只好裝起來。」怎麼會沒有地方擱呢？多少房間空著，門上掛著大鎖。我打起精神向他請教，現在社會上文物交易頻繁，也有不少流入國際市場，作爲北京故宮工作人員，對此不知有何想法？他笑說：「市場上流通的多半都是假貨，中國地大物博，文物太多，流出去幾件也算不了什麼，只要不是海內外孤本就行了。」可是輾轉流入香港，然後由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新藏

的「子犯和鐘」十二件，以及由台灣和香港收藏家收藏的另外四件是否不在這「海內外孤本」之列呢？

至於說到中國大陸文物太多，大陸學者早有不同意見。一九九四年五月大陸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彭卿雲先生就在河北文物工作會議上指出：

①大陸現在的文物保護單位五〇〇〇處，第四批審批後可達一〇〇〇〇處，印度卻有五〇〇〇〇處。

②大陸博物館館藏文物一〇〇〇多萬，一級品十萬，加上文物商店所藏一〇〇〇〇萬件，也不過二〇〇〇萬件。美國一個博物館本身典藏品一七〇〇萬件，兩相比較之下，「文物太多」的說法無法成立。

③意大利只有幾千萬人口，文物藏品卻遠較中國大陸多得多。

彭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很多地方出現的文物亂象，不表明文物多，而是說明大陸文物保護條件的落後。（原載《文物工作》一九九四年四月）我想，除了文物保護的條件之外，更重要的是心態方面的問題。文物不當回事兒不止是社會上一般人的心態，一些知識分子、文化人同樣沒把文物放在眼裏。近年來，大陸出過一本書，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作者何博傳，書名叫作《山坳上的中國》，全書五五八頁，將中國大陸面對的種種危機細作分析，由經濟到政治，由理論到實踐，由教育到人口素質，說得頭頭是道，但全書沒有半個字談到文物問題。何先生絕對是憂國憂民之士，只是在中國大陸四十多年顛來倒去之後，價值觀的改變已使人們，那怕是憂國憂民之士。也不把文物的毀損當作一個問題了。

在這裏，我想在價值觀錯置的亂象中，有關三峽的討論是一個極特別的例證。

一九八八年秋天，香港的各種報紙對三峽工程的議論已經沸沸揚揚。一九八九年春末夏初，北京出版社《十月》雜誌刊載長文〈三峽、三峽〉（《十月》一九八九年三月總第六三期）報導了《長江長江——三峽工程論爭》這本書出版並在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義賣的經過。一九八五年已經九十多歲的原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委員長孫越崎先生，率領平均年齡七十多歲的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三峽視察團，視察了三峽，提出了三峽不能上馬的意見。但是爭論的另一方是強有力的周培源先生指出，主張開始三峽工程的人很不科學，也很不切實，在工程預算方面，盡可能縮小，以達到開工的目的，一句話，周培源等等有識之士的落眼點就是「三峽的爭論，是關係到要不要科學，要不要民主，要不要決策民主化的問題。」因此，這本自

籌經費出版的《長江長江》在出版、義賣、義買的整個過程中，所努力表達的，仍是知識分子在政治、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堅持和抗爭。

在這篇熱情洋溢慷慨激昂的長篇報導中，我看不到一個字涉及中國大陸的學者、專家對三峽庫區文物古蹟可能遭受滅頂之災的考量。他們只報導了一位美國專家巴魯克·博克塞在一九八八年初在一篇文章中表達的意見。報導認為博克塞給大陸人提供了一點「超前」的角度和意識。博克塞在他的〈三峽工程——問題和前景〉一文中指出三峽工程的各種可行性研究都只集中在經濟的層面，而低估了在生態、社會和其他方面所付出的代價。他的這個「其他」裏包括了「下游冲刷污染物的變化、水質問題、土壤的侵蝕、某些生物品種的消失、及氣候變化、移民安置、三角洲及港灣的問題」最終還有「歷史古蹟的被破壞」，終於我們在這樣一份舉足輕重的談及社稷生死存亡的重要文章中，找到了「歷史古蹟」這樣四個字。

我們回頭來看專業報章雜誌的報導，看看三峽工程中，文物這個小小的不被那一百多位政協委員當作問題來考量的範疇，其問題究竟嚴重到什麼程度。

《文物工作》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熱點話題」談及三峽基本情況：工程竣工後，大壩冠頂高聳一八五米，正常水位一七五米，淹沒區下起楚鄂名城宜昌市，上至重慶、江津，涉及二十二個市縣。三峽文物古蹟不僅包括興山的香溪、巴東神農溪、巫山紫陽河、大溪、巫山巫溪大寧河、奉節草堂河、涪陵南川烏江、黔江「小南海」等，而且還輻射到長江兩岸的巫山大廟、梁平雙桂堂、涪陵金佛山，縱橫數千平方公里。在這個庫區內有距今二〇四—二〇一萬年的「巫山猿人」發掘地、巫峽南岸龍骨坡；「大溪文化」發源地大溪；秭歸屈原祠；奉節白帝城；雲陽張飛廟；涪陵白鶴梁水文題刻；雲陽縣境內已被確認的秦漢時代胸忍縣城址，其中李家壩遺址位於該縣高陽鎮，面積約二〇萬平方米，包含商代至漢代的文化堆積，與李家壩隔江相望的明月壩遺址，總面積達一〇萬平方米，文化堆積以唐代為主。（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據《中國文物報》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二日報導，經過三十多家科研單位一年多努力，三峽工程淹沒區的文物點總數已達一二〇八處，其中地面文物四四一處，各種結構古遺址四六〇處，古墓葬三〇七處，地下文物埋藏總量可達二二〇〇餘萬平方米。而且，根據有關方面認定，三峽地區有一處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〇處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新近列入申

報第四批國家及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不下五〇處。但是，三峽工程全部竣工為十七年，在九年之內，截流發電水位，將昇高至一五六米。百分之七十的古遺址、古墓葬分佈在此水位以下。就工作量計算，將整個大陸文物考古力量全部集中在三峽地區，工作時間仍需二〇年以上。更何況資金仍舊短缺，更何況，當政者只想著為著政治上的目的而要修建起一座現政權的「紀念碑」，並沒有把三峽工程對文物的破壞真正計算在內。在四十餘年的政治風雨中，文物古蹟與歷史文化相連橫遭批判、劫掠，在一切向錢看的今天，如若不能馬上變作物質財富，相反卻要花費大把的銀子去維護，在「價錢」當道的情形下，三峽工程引發的文物古蹟再次面臨大規模的破壞，是可預見的結果，我們似乎沒有什麼法子保持樂觀。

再有一個社會現象可以就「價值」與「價錢」之間的爭戰看到一點民間所表達的訊息，那就是古董市場、舊貨市場以及並非古董文物但是卻能在國際市場上賣到好價錢的稀有物，比方說恐龍蛋化石。大家一定會覺得非常好奇，恐龍蛋化石並非人類智慧與文明的結晶，與文化毫無關係，把自然界史前記錄的表徵和古文物混同，是概念上的混淆。但是，這裏的問題是大陸文物保護法規定古脊椎動物化石和古人類化石和文物一樣受保護，所以在大陸人的價值觀裏，恐龍蛋化石的價值不會低於「子犯和鐘」。問題並未到此為止，如若我們將九〇年代在河南西峽恐龍蛋化石群揭秘的過程，和一九七四年春秦始皇兵馬俑發現的始末作一個比較，就可以發現更深層的文化現象。

陝西省臨潼縣宴塞鄉西楊村村民在打一口井的時候，發現了紅土層，挖出了「瓦盆爺」和陶片，引得村民們圍觀，這時候一位水保員（可以說是最基層的水文工作者）到該村工地檢查工作，馬上下井觀察，發現了秦磚。他上井以後，馬上告訴村民：「這磚和秦始皇陵出土的秦磚一樣，這井暫時不能挖了。他也馬上和文物工作者聯絡，陶俑就這樣得到了保護。那時候是文革時期，一切的混亂並沒有過去」。

河南省西部小縣西峽一向不引人注意，當地鄉民在山上發現球形石頭，孩子們也曾將它當作足球來踢，但是當地質工作者發覺這可能是世界罕見的恐龍蛋化石的時候，最早浮出意識的思考方向是，這個東西可以賺錢，可以賺大錢，所以恐龍蛋化石的交易，是在某些地質工作者導演下演出的活劇。

這使我們想到了教育問題，文革後期這位保護了秦俑的水文工作者所受的教育是在文革以前完成的，雖然文革破四舊的

運動打翻了人們對文物的基本認知，但這位知識分子的深層意識裏，文物的價值無法磨滅。而九〇年代的地質工作者，他的教育是文革時期完成的，在他的意識深處，文化、倫理、道德、完全沒有地位，中國老百姓說的「頭上三尺有神明」於他而言是無稽之談，他頭上三尺白茫茫一片，什麼都沒有。歷史也好、宗教也罷，甚至科學都不值得敬畏，世上只有趙公元帥最好，爲了錢，什麼事情也都可以作的。於是恐龍蛋化石的商業行爲由此而生，剩下的只是價錢高低和如何從中謀利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還有一個社會現象表現出一種特質，這種特質和社會的基本結構密切相關，那就是拍賣。

對於西方社會和台灣而言「拍賣」是一種商業行爲，和意識形態問題無甚關連，拍賣行情與市場需求成正比，是普通的情況。當然，人爲的特意去製造出來的「需求」也時有所聞。除了大型拍賣公司蘇富比、佳士得等等以外，台灣也出現各種不同類型的拍賣活動，在高雄，我也曾在深夜去看一種民間小型的拍賣，常以茶壺、陶器等社會大眾喜歡的收藏品爲拍賣對象。這種活動也常常在街市上露天舉行。主持拍賣的與參加拍賣的多是舊識，當一件收藏品叫不出好價錢的時候，收藏者會笑着把東西收回，甚至爲在場的朋友「有眼不識金鑲玉」而惋惜。這種皆大歡喜的拍賣，常常使賣家和買家及圍觀者多了一個欣賞與鑑別的機會，在今天如此富裕的台灣社會是一件調適身心的事，有它積極的一面，尤其可取的是這種民間活動常常是無傷大雅的小小商業活動，恬淡而隨意，像極了高雄社會的人際關係。

大陸的情形有所不同，文物素來被冠上意識形態的大帽子，文物所代表的歷史源流常被大批判的浪潮吞沒，偶有浮現則被眼下的政治需要所利用。北京市大葆台西漢墓發掘的時候正值批林批孔的高潮，於是考古被用來作爲緊密配合批林批孔的活的例證。（一九九五年三月五日《中國文物報》）歷史上最後一次祭禹是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事隔六〇年之後，浙江省決定今年內在紹興舉行公祭，於是禹陵、禹祠和禹廟有福了，得以修復和添建，《人民日報》更稱「大禹是中華民族的『立國之祖』」（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八日海外版）這和多少年來高唱的「大救星」「紅太陽」很有些不同，當然與統戰與吸收海外資金等等當前的需要密不可分。促進兩岸文物交流自然納入統戰軌道，《中國文物報》一九九五年三月五日報導中國文物學會座談會盛況時，指出：「專家們一致認爲，開展對台文物交流，要以弘揚歷史文化，加強兩岸同胞的凝聚力，促進祖

國統一大業為根本目的。」

儘管對岸意識形態方面的目的這麼明顯，局外人看來，台灣社會各界的態度用得上一句台灣俗話「老神在在」。能夠弘揚歷史文化，就把它當作一件有益的事來作，其他，就是另外一件事了。多一點文化，少一點政治是此岸人們的心聲。彼岸卻可以從任何渠道滑入政治的巢臼之中去的。

一九九四年五月《收藏家》雜誌第七期，報導對佳士得上海分公司首席代表朱仁明女士的訪談。朱女士表示：「二三〇多年佳士得的拍賣業績已使今天的佳士得成為一種文化標誌，佳士得之槌已經成為人類精神價值的表徵。」不僅如此，朱女士從佳士得在亞洲、在中國的成績，認定只有中國經濟強盛了，中國藝術品的真價值才能得到體現。對於大陸而言「拍賣」是一個新的東西，況且，這樣一個新的東西，剛一出現就帶來了一大堆不切實際的混亂的觀念，對於在極短時間已經面對太多新事物的大陸人，實在是不公平的。佳士得只是在供求之間的一個橋樑，什麼時候也不會成為文化標誌，更不可能代表人類精神價值。秦磚漢瓦、青銅器都是重要的中國的藝術品，但是無論中國多麼強大，這一類不是人見人愛，也不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入門的重要文物都不容易在佳士得賣到好價錢，而在佳士得賣不到好價錢的文物就是沒有價值的嗎？在「拍賣」的概念如此混亂之中，產生一些問題幾乎是必然的。在一般民衆的心目中，「拍賣」這一行似乎是個賺錢的行業，而且「拍」得好的東西該是行情看漲的東西，似乎其中發財的機緣就多著。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〇日《人民日報》的一則消息中聲稱「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隸屬於國家文物局」，二月十六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的一則消息還談到二月二〇日——二一日舉行的「嘉德——北京皇家俱樂部古董拍賣會」的部分拍賣品來自北京文物局、山西文物局和陝西文物局的收藏品。這類消息的發佈所引來的輿論當然是可以想見的。《中國文物報》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二日作為國家文物局的發言人對上述報導作了澄清，再三申明文物局不能作生意。並說明「這次拍賣會的拍賣品來自北京、陝西、山西三地的文物商店及從其他十個省、市征集來的民間收藏，並非三省市文物局提供的館藏文物。」在這篇文章的最後，提出一些記者對「文物法律、法規不甚了了。文物拍賣當前非常敏感」的問題。這則報導，最起碼可以說明兩點：（一）「文物問題」對很多人，比方說那兩位「不甚了了」的《人民日報》記者，不是一個有價值的問題。

(二)「拍賣」概念不清、法規不嚴，又直接與價錢掛鉤，自然非常敏感。

其實對於拍賣之中「手段之惡，文飾之巧」許多「自欺欺人，掩人耳目」「藉富國裕民之名，射利圖私」的行徑早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國文物報》上傳振倫先生就痛心疾首地作了批評，只是沒有引起警惕罷了。對於「拍賣」中出現的文物回流，大陸有媒體歡欣鼓舞，認為國內拍賣價格上揚造成「回流」可根本解決盜賣，走私之風。一九九五年四月香港《資本家》雜誌披露，在「拍賣」風的熱鬧中，實在是「外熱內冷」，問題不少，榮寶齋總經理邵宗遠先生說，自一九八八年和香港拍賣行合作，到一九九四年出現「回流」現象，據他分析：出現這種回流現象，與大陸人處於經濟、文化轉型期的某種特殊心理有關。一些有錢的公司，「大款」，為提高企業的知名度或自身的文化身分，以高出市場幾倍的价格購進藝術品造成「轟動效應」。

這使我想到了台灣《民生報》一九九五年七月七日關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新藏「子犯和鐘」的報導。《民生報》用了「青史留言青銅為據」這樣八個平實的字，說明了政府、學者和台灣社會對文物的態度，這裏沒有任何「轟動效應」，故宮器物處處長張光遠先生在他簡短而精確的「子犯和鐘」初釋的論述中，明確表達這組重要文物提供的時代背景，歷史的訊息及極為珍貴的學術研究價值。我居住台灣的時日雖短，只有三年，但是我常來台北故宮，每次來必學到新知識，秦院長、張副院長、張處長光遠先生，展覽組組長周功鑫女士都曾不止一次地強調過，他們對於有重要學術價值的禮器等重要文物高度珍視。《故宮文物月刊》等出版品對台灣社會更具教育和引導的積極作用。一些古董業者和收藏者本人就常現身說法，帶領民眾學習鑑賞。

在台灣，文物古董市場寬闊，品類眾多，延伸的空間和忍受庫存的時間遠比其他藝術品有耐力，不必考慮景氣，不必追求熱門和時髦，富足而教育普及的台灣社會，以一種平常心看待著文物與古董的流通，（《典藏雜誌》一九九三年六月號）也就是理性的收藏意識逐漸抬頭。

在北京，我去了一趟紅橋文物古董商場，在那裏，發現雖然經營者多是年青人，但是古物市場的氣氛相當悠然，很有點老北京因為文化底子厚而顯出的自信和優雅。這些年青人不只是作生意，他們也花時間讀書，也花時間向行家裏手請教，文

物和他們之間的關係不止是錢，有了一點歷史，有了一點文化，其中一位年青業者向我介紹一些古錢時，已經很有了一點專業知識，同時，他並不急著脫手，很有一點「貨真與識家」的氣度了。

結語

我是一個用中文寫小說、寫散文的美國人，精確而科學地討論文物保護的問題，在我是第一次，在收集資料，研究數據，力求有根有據的同時，我也會瞥見一些文學作品，文學與考古之間有一條神祕的紐帶，這條紐帶就是人的精神力量，古建築、古董文物無言地面對歷史長河，它們本身是歷史的一部份，它們本身是人的創造性勞動的結晶，文學的產生卻是人的精神以文字留下的記錄，在這記錄裏，我們可以尋到一些微細的軌跡，它們可以更感性地告訴我們一些真實。在我返回美國，伏案作功課，在堆積如山的資料中尋尋覓覓的時候，一本雜誌，一直在我手邊晃來晃去，那是今年八月份出版的香港政論雜誌《九十年代》。《九十年代》是我的老朋友。《七十年代》讀到《九十年代》很親切的。在這期雜誌裏，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有一篇題為在〈古老文明的廢墟裏〉，這篇文章被我從雜誌裏裁了下來，它不斷麻煩我，讓我不能靜心作功課。文章說，新井去了福州——一個歷史悠久的古城，有夜總會、舞廳，卻找不到書店，報攤。沒有東西看的日子是沒有法子熬的，於是她衝進了外資酒店的商場。結果，那兒只有英文版的《鄧小平文選》！當她在一家酒店的接待處發現香港的《文匯報》和《大公報》的時候，高興壞了。她作結論說，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人的標準自動往下調整。她走一走、看一看之後，對大陸人的素質十分悲觀，對於文革後成長的一代，從小在「向錢看」的潮流裏受洗禮的一代人最沒有信心。她認為：在曾經有古老文明的中國，十年文革不僅破壞了傳統文化，而且殺死了「價值，這個概念本身，但價值觀是所有文明的基礎。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白貓黑貓》論，不談原則，只談效果，是徹底的權宜之計」。她對大陸四十五年社會實驗的總結是：「若想把一個古老文明殺滅的乾乾淨淨，先搞十年文革，再搞十年改革開放：最後以社會主義經濟畫龍點睛即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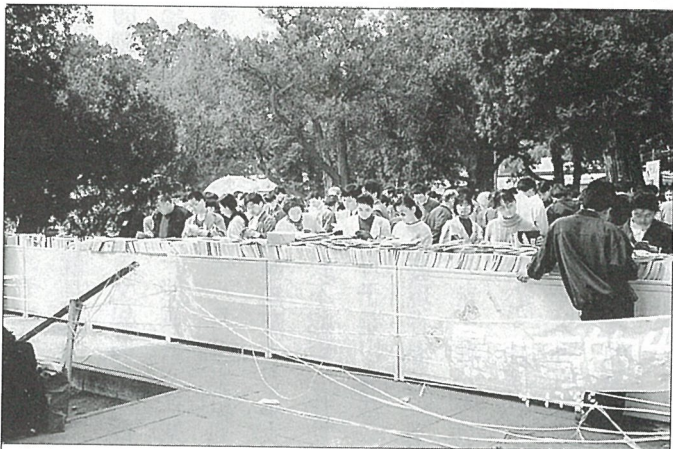
對新井的憤怒，我完全瞭解，但是我沒有那麼悲觀，因為我曾經度過了那最沒有選擇的日子，我在新疆的九年，合法閱讀的對象只剩了紅彤彤一片的所謂「紅寶書」。中國的文明，人類的文明離我何其遙遠。面對的又是「大漠孤煙直」的荒

涼，真正是毫無出路和指望。標準卻沒有相應地自動調低。我心裏卻在一頁頁翻看那些已經被吃下去了的書，默念着「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有山有水有彩雲相伴，更有世上最美麗的語言和文字長駐心頭，周遭那一片「打倒」之聲是可以充耳不聞的了。因為有這點信心，今年四月在北京，去了一趟書市，書市設在公園裏，擠滿了人，看書的、買書的年青人讓我覺得希望猶在，並沒有完全死滅。

和新井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有不少大陸作家的文學作品。

一九八六年四月號《小說月報》有一篇王蒙的小說，小說篇幅長一點，可以更透徹地揭示一點人內心深處的東西，對於新井所謂「殺滅文明」的過程可以看得更加清晰。王蒙的小說系列是《新大陸人》，這一篇叫作《輪下》，寫一個中國的「不肖子」，一個準備在美洲新大陸多呆一個時期的中年知識分子，王蒙的同齡人。這位「不肖子」曾經愛書，而且崇拜著書立說的人，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在精神上擊垮了他對文明的渴慕，接踵而來的大饑餓又粉碎了他作人的尊嚴，他賣掉了《辭海》，跨出了致命的一步，從此他那顆容易沉醉的心一天天麻木了，他甚至可以笑著說：「感謝」文化大革命，解除了自己肩上一切政治壓力、思想壓力。那笑裏面有多少怨毒、有多少悲涼、有多少絕望，非過來人無從想像。當所有的理想與純真都被粉碎之後，他的行為模式自然是被王蒙們批評的了。但是誰是始作俑者呢？好在，今天也有人不肯善罷甘休，天津作家馮驥才先生講得好：一個民族的歷史不管曾經怎樣的燦爛輝煌，但它在沒有文化的後代手裏只能斷送，在有文化的後輩手裏才能永遠光彩奪目。（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國文物報》）

在作功課同時隨意的剪下兩則報導，一則是《中央日報》一九九五年八月二日鄉情版上一篇誠摯、懇切的文字，談到台



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書市 筆者攝

北中山橋的拆遷與搶救的問題，如此的古籍閱讀，為現代人留下記憶，給現代人啟迪的文章是《中央日報》的常課。另一篇是《聯合報》有關文化資產的議題：這一天的報導是宜蘭企業家李正富捐出土地，挽救丸山遺址，立下文化資產與建設工程衝突「善」的處理模式。發人深省。

伏案作功課，手邊一青銅一琉璃兩個紙鎮，仿的都是漢代青銅瑞獸螭的優美造型。一個來自國立故宮博物院，一個來自琉璃工房，六年多來，楊惠珊、張毅、王俠軍幾位藝術家所走過的路是由台灣出發，奔向世界，再走回到中國的傳統，才有今天傲人的成就。中國是琉璃藝術的原鄉，紐約Soho的著名琉璃藝術家們談到琉璃，言必稱中國，張口就是漢代如何，西周又怎樣，楊惠珊和琉璃工房收集、研究中國老琉璃，使那荒蕪了二千年的琉璃之園再次姹紫嫣紅起來。

一位大陸的朋友去了河南省渾池仰韶村，就是那個比秦漢時期再早上數千年的仰韶文化的發祥地，滿目荒涼。找得見以「仰韶」為名的「大廈」、「酒廠」、「水泥」。但是何謂仰韶文化？村人隨手一指：「到處都是。」入眼的瓦塊陶片、碎石白骨使這位北京人痛不慾生。朋友對我說：如果有力量使我們的文明不毀損盡，那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我對朋友說，任何演說、任何文章、大小會議、各種「轟動效應」都無法掀起任何一種高潮，造成任何新局面，我們大家，無論是台灣人還是大陸人，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要作的只有一件事，點點滴滴從細微處做起，持之以恆地以科學的態度珍惜文物歷史和文化。

兩岸文物保護方面的現狀千頭萬緒，價值觀的維護和重建是問題關鍵。在這千頭萬緒當中，作為中流砥柱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迎來了她的七十誕辰，我們期待，到了故宮百歲生日，不僅台灣站在中國五千年文明肩上已經騰步起飛，整個大陸也將改天換地，從文明的廢墟上站立起來。智慧的炎黃子孫將為人類文明作出新的貢獻。

我們企盼著那一天在我們大家持之以恆的努力中，早日到來。謝謝各位。

故宮學術季刊 第十三卷 第四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Protecting Antiquit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History, Influences and Attitudes

Teresa Buczacki

Abstract

1. Id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have led to obvious, major differences in the ways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regard and treat antiquities.

2. Differences in the two sides' attitudes toward protec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antiquities as reflected in their treatments of graverobbing, smuggling, auctions and preservation of artifacts and ancient sites; the role of museums.

3. The contest between value and price has produced different sets of winners and losers on each side of the strait.

Keywords: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海峽兩岸

Protecting Antiquities 文物維護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 一四九 through 一六四.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